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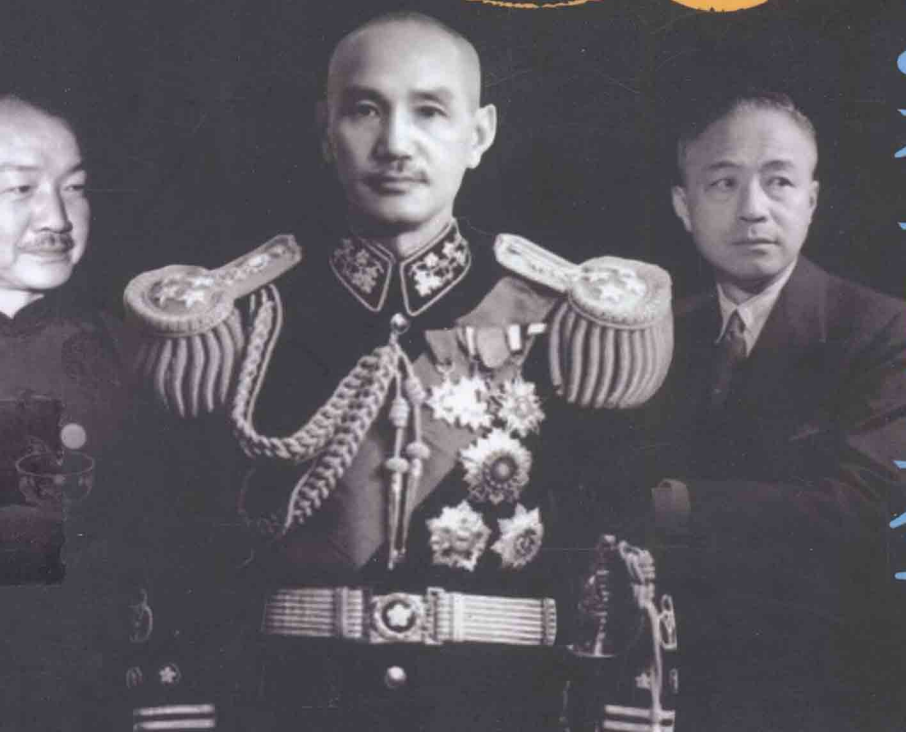
亲历者讲述

文昊◎编

蒋介石的智囊高参

打开中国第一家族的尘封秘史
透视民国高层关系的隐情秘事
解读一个短暂王朝的兴衰密码
剖析一代乱世枭雄的权谋秘术

一手独家史料
亲历亲见亲闻



亲历者讲述

蒋介石的
智囊高参

文昊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的智囊高参 / 文 昊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5

(亲历者讲述)

ISBN 978 - 7 - 5034 - 2910 - 1

I. ①蒋… II. ①文… III. ①中国国民党—历史人物—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077 号

责任编辑:曾小丹 马合省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盈盛恒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 1020 1/16

印 张:22.75 字数:320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妙笔生花，御用“文胆”陈布雷 (1)

陈布雷出身于新闻记者，英气早发，笔露锋芒。自追随蒋介石之后的二十二年间，凡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电，几乎无不出自其手。他长期参与国民党中枢机要，出谋献策，常能提出预见性的政治见解。蒋介石对他深为倚重，外界更是把他视为“辅弼重臣”，推为“当代完人”。但他自己却不止一次地对亲近的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并多次告诫后辈：“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陈布雷曾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或许正是这个“东西”使他最终选择了自杀之路……

一、我的舅父陈布雷 (1)

二、先兄陈布雷杂忆 (25)

三、陈布雷的自全之道和难言之痛 (45)

四、利用经济情报观察政治动向的奥妙 (53)

第二章 舞文弄墨，反共先锋戴季陶 (58)

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极其亲密，是蒋家王朝中的一个幕后重要人物。他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又以“反共理论家”自诩。而就其所言所行来看，确实令人感到怪异、复杂。他早年从事新闻职业，曾与陈布雷共事多年，并以“天仇”为笔名表示自己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以明革命心迹，但后来却蜕化为一个复古而又迷信的官僚政客。他一面以笔为枪，积极投身反共，一面又显示“皈依”佛门，取法名“不空”。1948年初过生日时，蒋介石偕蒋经国前来祝

寿，但戴季陶却以“天大地大不如佛大”为由到佛堂念经而拒见。仅一年后，他便选择了与陈布雷相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蒋戴关系为什么会由热变冷？戴季陶因何自杀呢？

- 一、我们所知道的戴季陶 (58)
- 二、从革命到复古的蜕变 (72)
- 三、戴季陶为何砸瓶子？ (76)
- 四、戴季陶与南京考试院 (77)
- 五、戴季陶自杀真相 (80)

第三章 借力使力，后起之秀朱家骅 (83)

朱家骅在国民党内原本只算是“小字辈”，但他却工于投机钻营，惯于攀权附贵，终于以一介书生之身而跻身于国民党显要行列。在蒋家王朝中，朱家骅是一个兼具党棍政客、学阀身份的核心分子。他一贯披着学者的外衣，始而依傍张静江、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派，继而投靠陈立夫、陈果夫和宋子文等党国新贵，中间并因走通了宋美龄这条“夫人路线”，故而屡任要职，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权倾一时。1949年国共和谈时，中共把朱家骅列为四十三名战犯之一；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蒋介石又委任他为“总统府资政”。由此可见他的确不是一般人物。

- 一、我所知道的朱家骅 (83)
- 二、朱家骅的发迹及其他 (92)
- 三、导演“向领袖献九鼎”的丑剧 (111)

第四章 宠幸不衰，“得意的政客”张群 (114)

为博蒋介石信任，张群尽其所能苦心钻研“事上之道”。他在蒋介石面前总是百依百顺，除了升官发财这一点外，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以蒋之立场为立场，不敢有丝毫异议。时人曾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唯知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令人奇

怪的是，张群对于这种评价竟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自己甚至说：“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此种心态绝非一般人可比。

一、政学系的后台老板 (114)

二、为蒋介石图川积极奔走 (122)

三、与王缙绪围绕四川省政的争斗 (136)

四、妄图争取卢汉建立西南反共基地的阴谋活动 (139)

第五章 呼朋引类，政学系群丑揭秘 (154)

除了被人称为“智多星”的张群外，政学系还有两个首脑人物，即杨永泰和熊式辉。他们被称为政学系的“三巨头”，此外还有一批包括黄郛在内的所谓“名流学者”。在蒋家王朝中，政学系的许多上层分子都曾备受恩宠，红极一时。但到头来机关算尽，仍不免走向衰亡之道。

一、杨永泰、熊式辉和“新政学系”的崛起 (154)

二、杨永泰的政治图谋和军事野心 (169)

三、蒋介石对杨永泰特别宠任的关键 (175)

四、CC系反对杨永泰的一幕 (179)

五、杨永泰被刺内幕 (181)

六、黄郛与亲日卖国的《塘沽协定》 (184)

七、《塘沽协定》亲历记 (190)

八、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 (191)

第六章 南北财神，经济高参面面观 (209)

蒋介石身为一介武夫，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为了应对经济问题，他除了借助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带关系外，有时也不得不仰仗某些财阀和懂行的人作为参谋。尤其在登台之初需要筹集款项，以及孔、宋极尽搜刮之能事而捅出篓子时，更是如此。当然，就彼此关系而言，蒋介石对这些经济高参只是想利用而已，所以一向抱着尊而不亲、用而不信的态度。

一、随缘善变，陈光甫“押宝”蒋介石 (209)

二、入幕蒋家的“北四行”财阀吴鼎昌、钱新之	(219)
三、张公权临危受命出掌中央银行	(236)
四、敢于政治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虞洽卿	(247)
五、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内幕见闻	(257)
第七章 变节投敌，叫嚣反共的叶青	(269)

叶青本是中共党员，因不慎被捕而叛变自首，但仍被处以死刑。不过，他大难不死，以后便走上了反共的道路。由于他和蒋经国同为留苏学生，故而借此攀上高枝。加上他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共的所谓“理论文章”，日益受到蒋家父子的垂青和厚爱。

一、大难不死，改弦更张	(269)
二、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	(270)
第八章 倚洋自重，仰人鼻息成泡影	(273)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一向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因而他幻想倚洋自重，先后聘任过许多外国军事高参。但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极其可笑的，在引狼入室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不少麻烦，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国民党政府军委会顾问处的起源与演变	(273)
二、民国时期几个军校的外国顾问	(276)
三、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军顾问	(280)
四、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	(290)
五、我所知道的德、英、苏军事顾问	(341)
六、蒋介石聘用的四届德国顾问	(343)
七、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	(344)
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	(345)
九、关于“合步楼公司”的片断	(347)
十、意大利顾问与国民党中央航校五期甲班	(349)

第一章

妙笔生花，御用“文胆”陈布雷

陈布雷出身于新闻记者，英气早发，笔露锋芒。

自追随蒋介石之后的二十二年间，凡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电，几乎无不出自其手。他长期参与国民党中枢机要，出谋献策，常能提出预见性的政治见解。蒋介石对他深为倚重，外界更是把他视为“辅弼重臣”，推为“当代完人”。但他自己却不止一次地对亲近的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并多次告诫后辈：“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陈布雷曾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或许正是这个“东西”使他最终选择了自杀之路……

一、我的舅父陈布雷

曾经担任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的冯乃超，1979年10月建议我给陈布雷写一篇传记性的文章。他信上说：“你对陈布雷比较熟悉，找资料可能有较多的线索。为这一走错了路的知识分子写个传如何？给蒋介石拿笔杆子，想来不会愉快，我不知什么原因，似乎觉得他当时是感到痛苦的……对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应作一番客观的分析，单看进步的一方面的人们是不够的。”四个月後，他给我的信中又提到此事：“《民国史》编写的任务，我想各校都有分担责任。《陈布雷传》你独立写一篇何尝不可？要有决心上图书馆（报库）里泡一段时间。这样也可能是一种锻炼。”

可是，我却迄今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布雷先生虽是我的舅父，我的

父亲翁达（祖望）在陈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多年，但我对陈了解不多，不深透，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这几年中，我写过几篇有关陈布雷的短文，发表后引起相当普遍的注意，但全面性的传记却一直未敢动笔。现在，我就权以本文替代那至今未能完成的陈布雷传记的撰写任务罢。

写了一生文章，却无著作传世

陈布雷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一生写了很多文章。二十二岁（1911年，宣统辛亥），他方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即就任上海《天铎报》撰述。当时规定的任务是，每天写短评两则，每十天写社论三篇。以后，他在上海《商报》任编辑主任时，写的文章更多。在《天铎报》时，一部分评论用“布雷”署名；后来在《商报》写的社论，则大都改用“畏垒”署名。可是到了后半生，他主要是为蒋介石代笔写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写的文章就极少了。偶有，多半也是为至亲契友写的寿序、悼文之类。这本《回忆录》是从他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写起，到1939年五十岁（虚岁）为止，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他家庭生活、求学经过以及办报和从政的经历。原稿是用老式红格十行本墨笔写的（他习惯用这种簿子）。分两册：第一册是1936年夏他在庐山写的，写到1921年；第二册是1940年在重庆老鹰寓所养病时续写的（正是他五十生辰后一年）。出版时合成一册，二十开本，共九十五页，约七万字，还附了十帧照片，人们可以从这一本《回忆录》约略了解他的一生，可惜写得早，抗战胜利后就没有接续撰写，以致不能包括他一生最后九年的记录。《回忆录》前，陈夫人王允默写的“前记”中，虽述及“至五十岁以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亦在整理搜集中，一俟有成，即当陆续付梓”。但后来很快全国就解放了。据我所知，陈夫人对陈一生中发表的重要文章，大抵剪贴成册（据说有两本）。同时陈自己从1935年3月起，天天都写日记。未尝中辍，到他去世为止，也有十三年半，十行簿至少得几十本。这些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抄家风中全被抄走，一度以为已经散失。现已查明存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就史料说，应该是件幸事。因为这是第一手材料，不仅对研

究陈布雷本人十分有用，即从研究中国现代史角度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孝父忠“君”

不少人说陈布雷的封建意识相当浓厚，这是事实。陈布雷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依仁府君有两个兄长。兄长生了一子（陈训正，字杞怀）二女；仲兄无子。依仁府君却有七子七女，陈布雷居长（后来过继给二房了）。陈对父母极尽孝道，事事向父请示。父有命，从不敢违。十四岁时，父命应童子试，尽管心里极不愿意，还是去应试了。十七岁时，他在慈溪县中学堂求学，奉父命转学于宁波府中学堂。次年，因故在宁中辍学，得友人介绍而投考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也是请示父命而成行的。1910年夏，是他结婚后一年，在浙高正科还未毕业，却值浙省议送官费生十名赴欧美。他得到了浙高老师、岳父杨逊斋（号敏曾，历史学家，后任北大国史教授）的赞同和鼓励，在已考国文、英文、数学三门主课后，由于父亲以家庭原因去信劝阻，他也就遵命放弃了这一机会。1911年6月，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在《天铎报》担任半年撰述，很快以长于撰论出名。当时，戴季陶创办《民权报》，叶楚伦创办《太平洋报》，陈陶遗接盘《申报》，都对陈有相约之意。陈自己不敢做主，请命于父。思想保守的父亲，认为上海“洋场”，非青年所宜久居。正值从兄参与发起创设宁波效实中学（1912年，即民国元年3月），所聘教师多是上年浙高毕业的同学如文科的董世桢（贞柯）、理科的冯度（威博）、王子让等。陈又从父兄之意，受效实中学英文、史地教员之聘，而放弃继续办报之机会。1914年7月，依仁公忽病故，遗子女多人，陈哀痛逾恒，且根据其父遗愿，毅然摆脱一切，家居达五年之久，专门经纪家务，并继父志处理家族事务以及乡里公益事业等。这同他个性格格不入，但还是一心一意地去做。而且在父丧后两年中，还谢绝在甬兼课之约，显然还有“重孝”不出的用心。1916年，效实同事虑陈乡居苦闷致病，力请兼课，始每周去甬任课若干小时。直至1918年发妻杨氏以产后子痫症去世，始于次年辞去族中事务而去上海。

后来，他做了蒋介石的幕僚长，其忠心耿耿的程度，亦为近世文人中所罕见。正如他的遗书中所说：“我心纯洁率直，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最后以“感激轻生”自了。他对蒋可说达到愚忠的程度。

还有一件小事，时间在1933年夏。陈布雷回到浙江慈溪官桥家乡，为其祖母祝百龄“冥诞”。有一天，慈溪县县长来拜会，陈闻悉立即换衣，穿上长袍马褂出迎。其实他那时已两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还担任过一年教育部次长，而来者不过是一个县长。但他丝毫没有一点自大或轻视之气，相反，却是恭陪交谈。县长告辞时，陈直送至大门，弄得县长“诚惶诚恐”。过后，家人问他何必这样谦恭，他说：“县长是地方‘父母官’，我回了家同是‘治下民’，自应加以礼敬。”可见，到这时他他还是恪守封建礼教而不稍苟且。

反清反帝及其局限

陈布雷自早年起实在又是一个思想活跃、具有革新精神的人。他热爱新闻事业，且把前半生的二度记者生涯视作一生的“黄金时代”。其后进了官场，仍对报人生活梦魂系之。这说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少年时代，他曾参加过“覆满同志会”秘密团体，课余喜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刊物。十七岁那年，入宁波府中学堂方两月，因发表演说中批评校内旧生生活腐化，竟激起学校风潮，后来他不得已自动退学，但进步的教师和学生都同情他、支持他。十八岁，他进了浙江高等学堂预科，4月，杭州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他任会场新闻编辑，这是他对新闻工作的第一次尝试。当时，国文老师沈士远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陈与同学们在课堂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而毫无顾忌。这年秋，他充任学生代表参加“浙路拒款会”，反对借英款筑沪杭甬铁路，组织宣传，并集队请愿。1910年，清廷尚未倒台，他就与同学相约，剪去了辫子。1911年10月，武汉义师发动，他一连写了十篇《谈鄂》，在《天铎报》上发表，鼓吹革命；并参加在上海张园举行的民众大会，发表演说。次年3月，宁波成立同盟会支部，他立即报名加入。参加成立大会之日，

还与徐家光、林斗南（名瑞甫，曾任商校校长）为选举事，展开激烈辩论。陈自己说当时“年少气盛，自视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集会，辄自登台，好评鹭人”。后来受到他的老师冯君木的批评，说：“少年时炫露才华，祇自形其浅薄。”他对冯师素极敬佩，从此他就遵师教而“不再在大庭广众中轻率发言”了。

陈布雷那时期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是鲜明的。1923年，曹锟进行贿选，他不避艰危，力持正论，在为《商报》写的社论中抨击受贿者为“猪仔”议员。1924年7月，他在《商报》本埠新闻栏写评论，抨击公共租界当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谓《出版律》，遭工部局控告，被传至会审公廨出庭受审多次，几被投入狱，经延律师辩护，总算罚款了事。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工部局警察头目爱佛生在学生爱国游行时突令开枪，打死南京路上游行的工人、学生多人。6月1日，全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风潮。那时，陈作为《商报》记者，不仅每天撰写反对英帝日帝暴行、鼓舞群众的评论，而且还深入群众团体，进行采访，奔走呼号。这里留有陈当时写给其四弟训慈（时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的家书中有关的一页，抄录如下：

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极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愁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瑄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这是家书（信末未写年月，时间当在那年6月10日左右），与当时

《商报》社论相印证，更可见其爱国、反侵略的真实性。信中提到的“瑄卿”，即当时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李瑄卿，似可见他的思想尚未能摆脱“国家主义”的窠臼。但据甬上教育界中人说，陈当年连续发表在《商报》的社论中，对五卅与以后各处惨案，均竭力主张“惩凶”与撤销领事裁判权等等，支持粤港工作长期反英罢工，直至万县惨案的反英。欢呼九江、汉口的收回租界，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不过五卅阶段，陈的持论又主张“缩小对象”，逐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不尽一致了。他对当时以虞洽卿等为代表的“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虽也有反感（见《回忆录》），但未能看穿当时上海和各地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早有动摇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买办威胁和利诱下，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终于单独宣布停止罢市，与工商学联合会唱反调，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段时间，陈的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的立场相当鲜明，因此，他的文章深受上海中产阶级及广大市民的喜爱，《商报》社论脍炙人口，甚至当时共产党刊物《向导》也常转载他的文章，有意罗致他，但终因他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未能再前进一步，而竟无形中退缩持平。

抗日的决心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陈布雷在五卅前后已早有认识。五卅事件原由日本资本家在上海办的纱厂枪杀华工而起，以后又勾结英捕屠杀游行学生酿成惨案。当工潮中，《商报》发表了反日侵略与抵制日货自救的社论。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进攻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蔡公时），死我民众，宇内激昂。陈在报上撰《暴日应惩》社论，后来在《时事新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好些反日文章。其后日帝侵华日亟，自九一八不战而失东北三省，至一二八淞沪战役等，陈自也忧愤日深。可是，他那时已进入国民党官场，就不能随心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后在南京供职，更进而只能执笔为蒋介石说话了。他常对亲友提及，抗战开始时，他奉命写的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稿和1938年奉命写的《驳斥近卫声明的宣言》的长文，

是他多年来最称心之作。前者是宣布抗战开始，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而后者则是反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诱降，表示中华民族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和他自己的思想和希望完全合拍，所以写来得心应手，写成后心情舒畅，事后还津津乐道。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关键时刻，陈布雷一家曾出现四人竞相投军的感人场面。第一个报名是他侄儿陈迨（现在台湾），1943年末在重庆南开中学与同学数人率先报名投效中国远征军。陈知悉后，即挥笔题了一段勸勉的话，如下：

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凯旋归来。

稍后，三子陈适，五子陈迈，也先后报名从军。当时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投军。陈适在同济大学学测量，报名参加炮兵；陈迈在交通大学学土木工程，报名参加工兵。陈适怕父亲阻拦，事先未告诉父母。陈迈也踌躇再三，未敢启齿。没想到陈布雷知道儿子报名投军，非常欣慰，马上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勸勉。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原诗如下：

儿名曰阿迈，儿字曰季前；儿今从军去，能为弟兄先。当时命名意，相合何适然！儿性纯驯笃，赋秉得之天；一旦奋壮志，猛着祖生鞭！问儿何所望？破虏靖烽烟。问儿何所忆？乡土陷腥膻。问儿何所乐？驱敌东海边。国家有急难，吾宁计安便？貔貅十万众，联臂自翩翩。誓为先驱卒，不愧先泽贤。再拜别父母，会看儿凯旋。汝父嘉尔志，汝母有欢颜；人生大幸事，忠孝得两全。贻儿以短襦，戎装裹鲜妍。愿儿身壮健，祝儿金石坚；勸儿无他语，报国及盛年。我心殊欢悦，我有笔如

椽，盾鼻染余墨，为写送行篇。

这首诗通俗晓畅，毫无矫揉造作，民族精神贯穿全诗，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诗中连用三个“问儿”，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在民间一向流传的《木兰辞》。

陈的幼子陈远（现在北京，改名陈砾），那时还在南开中学初中求学。这个自幼关心国家大事的少年，尚未到入伍年龄，竟然瞒着父母也去报了名。在体格检查时，唯恐体重不足，暗地里塞了好几块石头在口袋里。自然后来仍未能获得通过，使他很感失望。父母获悉后，劝他过两年再报名。当年国民党上层官员的子弟是没有人会高兴去当兵的，即使是小职员、小商人的子弟也很少肯投军，逃避当兵的事倒是到处可闻。从这里，可知陈布雷对子女是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

淡泊廉洁

陈布雷先生一生淡泊、廉洁，他做了半辈子官，从不搞特权，真正是两袖清风。他生活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是人所共见。寓中陈设简单，会客室中仅三件旧沙发；自己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颇不以为然。潘公展与陈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友，但陈一旦知其加入 CC，即渐与之疏远。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陈更是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么糟，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在作祟。但对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殊不知军统特务正是蒋介石用以自固权位的工具，而孔、宋二家及其僚属，如无蒋之宠信与裙带关系，哪能“笑骂由人”，久居高位？陈布雷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这些人周旋外，曾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祥熙）、宋（子文）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

1943年11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就是孔祥熙。蒋既出国，陈以待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关要事须与副院长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

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他一个信封（据孔在事后对他人说，内有一张一百万元的银行本票）说：“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聊表微意。”陈当即把信封掷还给孔，拒绝了孔的收买拉拢。过了些日子，陈的侄孙陈辟尘（陈纪怀长孙，抗战时在中央银行工作），在休息日来探望叔祖，陈把这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辟尘听，还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怎么样，怎么样……”据说孔祥熙当时做不到国民党总裁，就在中央银行编制中也设了一个总裁名义以自命。所以“你们的总裁”这一称呼是体现陈布雷对孔的嘲笑。这件事，陈辟尘迄今记忆犹新。

陈布雷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戴季陶、于右任、叶楚傖等都较熟悉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还是青年报人，对之企慕特重。陈同张治中、邵力子则更为接近而契好。邵力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卸任驻苏大使后回到重庆，就住在陈的家里。那时陈自己住在美专街一号，南首还有一幢四号的房子，因为办公地局促，无余室作亲友偶来居住之用而加租的。1943年，邵力子自苏回国，一时无住处，陈留他在四号屋子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陈、邵每天一起进餐，亲密犹如家人。陈称呼邵为“力子先生”。张治中对陈担负的政治任务与处境比较了解。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张治中到南京湖南路寓邸访陈，我正好在那里。张治中问我：“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说：“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惊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不过惦着他，特来问候起居而已。”我陪张在会客室坐了些时。张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我内心敬佩他。”陈称张也称文白先生，张来访时，常被迎到私室长谈。

对于CC系的二陈（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公私间都对人表示（包括对蒋的表明，并得到蒋的默许），不参与CC和什么中统组织。尤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治中心迁来重庆以后，更较疏远。据他当时身边的秘书告诉我：陈果夫常派他在侍从室第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的办公室走动，但很难得到陈的接见。陈还对他的秘书说：不要多接待，不要任意谈处里的事，防止内部消息外泄。陈还不接受以CC为核

心的合作金库名誉之聘，并告诫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致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刮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与郭沫若的交往

陈布雷与郭沫若抗战前在上海就有旧识。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陈布雷是很起一点作用的。当时郁达夫利用他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社会地位，也已在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对郭的通缉。陈布雷把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著作捧到蒋介石面前，称“郭沫若为国争光”，劝蒋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蒋把郭的著作翻了一下，同意陈的看法，准备按例先撤销对郭的通缉令。但陈深知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对蒋说：“郭处境危险，以不先发赦令为妥。”陈又认为“委座虽与郭有袍泽之谊，但郭毕竟是共产党员，对政府有疑虑”，力主与共产党配合行动。乃通知周恩来，由李克农通知阿英（钱杏邨），要郭的学生金祖同在东京活动，直到陪伴郭沫若归国。

1938年冬，我在桂林参加了郭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以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多年。三厅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单位。由于我的社会关系，那时我也做了一些有益统战的工作。因为三厅和后来的文工会，在当时虽然名为国共合作，纳入军委会的编制中，实际上是受国民党顽固派歧视、排挤的单位。郭老诗人气质浓厚，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免要激动。我通过陈布雷的关系，也在三厅和顽固派之间遇到障碍时，适当做些疏通工作。郭老和杜国庠不止一次由我陪去和陈布雷洽谈。陈多次表示对郭和杜的思慕之忱，欢迎他俩常去他家谈谈。上文说到“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这段话也正是那时说的。而郭和杜也认为“陈在国民党的不失为一个正直清高的人”。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诞辰，这一年又正好是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重庆文化界以文化工作委员会为中心，发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周恩来说：“这实质上是为了发动